

16/2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卢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卢氏文史资料



90

第四辑

卢氏文史资料

(第四辑)

85.12.12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卢氏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序 言

政协卢氏县委员会主席 焦贵忠

《卢氏文史资料》第四辑，本照“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和征集史料的时限（上自戊戌变法，下至建国四十年），共编入各类文稿三十五件，十万余言，将同读者见面了。藉此，让我代表卢氏政协，向所有撰稿、供稿和关心、支持、爱护本刊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忱！

坦白地说，我不懂文史，但又喜爱文史。因为她具有严肃、庄重、典雅之风度和“有益今人，惠及后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魅力。她不但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及各民族的团结，而且可以为群众特别是青年后代提供历史知识，使他们从中得到启迪。正如周总理所说：“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一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我深信，基于上两个目的而问世的《卢氏文史资料》第四辑，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刊始终坚持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为“时髦”的虚妄之论所惑，不受“向钱看”的“时尚”所诱，在冷漠中获得了许多知己。收入本辑的史料，在字里行间，都显示了她的这一特点。其中有：革命前辈赵致平同志撰写的

回忆录——“四友饭店”，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一组在秘密战线上同敌人斗争的人和事，张耀汉等同志撰写的有关抗日救亡与日寇罪恶杀戮之见证，高长生、孙维理二同志撰写的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斗的艰苦岁月，李育林、殷万华等同志撰写的县境“拉锯”斗争与地主“还乡团”屠杀无辜的腥风血雨纪实，都是凤毛麟角，稀有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的好教材。为什么近期曾有人为其罪恶累累的祖辈树碑立传呢？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缺乏对近、现代历史的了解，不晓得新中国的诞生是经过多少仁人志士艰苦奋斗、抛头颅、洒热血才得来的。还有余洛、刘维汉等同志撰写的农庄轶事、会见国际友人、上级首长在山村，王国庆同志撰写的干部下放和军民鱼水情，张卫东同志撰写的台胞台属通信探亲纪略，都是绚丽多姿且富有团结奋进气质的文章。此外，李啸东等同志，从古墓葬出土、墓志铭、地名词条、民俗岁时节日几个侧面撰写和提供的资料，既充实了我县文史宝库，又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辑文史资料，可以说是融教化与情趣为一体的产物。由于偏爱和限于水平，只能是“王婆卖瓜”的发此刍议。换句话说，虽去文就质，亦似不为过。

古人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让我们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桥梁”，同心协力，作出我辈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序 言	焦贵忠	(1)
“四友饭店”		
一一忆中共卢氏县地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赵致平	(1)
难忘“母亲”哺育情	莫肇基	(13)
对“国立小学”地下党活动的回忆	张耀汉	(17)
僧梁简介	莫肇基	(21)
刘好玉小传	吴国庆	(23)
卢氏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李瑞亭	莫肇基	(24)
怀念何俊雅	吴国庆	(27)
身陷囹圄志犹坚	杨 桥	(30)
洛师抗日游击队	张耀汉	(38)
揣老师与公师抗日救亡宣传队	段鹤让	(48)
日寇犯卢时杀戮之见证	景曼特	(53)
豫鄂陕根据地四分区的创立和革命斗争	高长生	(55)
忆战斗在毛河一带的游击生活	孙维理	(69)
七进六出卢氏城	李育林	(78)

对战友的怀念	殷万华	(83)
一二五师在卢氏	李育林	(87)
三打抱犊寨	牛爱民	(90)
革命烈士姚雪涛	颉毅	(94)
杨育华烈士就义前后	莫肇基	(97)
为“李大脚”立传	牛爱民	(100)
往事重提（三则）		

冯家湾更名 黄狗撕破豺狼心

春到“三不管” 吴国庆 (102)

中阿友好农庄轶事	余洛	(106)
在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作客	刘维汉	(115)
中共卢氏县委、县人委		

致阿中友好协会的贺电 (120)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

致阿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贺电 (122)

阿中友好农业社社员

给中阿友好公社社员的一封信 (124)

纪登奎在董家村抗旱 李芝松 (128)

情牵梦萦五里川	王国庆	(130)
伏牛山来了支解放军医疗队	王国庆	(135)

卢氏县台胞台属通信与探亲纪略 张卫东 (140)

致河南省卢氏县在台亲人一封信 王同希执笔 (143)

- 从古墓葬出土谈莫元龙父子 李晓东 (145)
明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耿公墓志铭 (149)
卢氏历史地名词条选 郭维东 (154)
卢氏民俗——岁时节令 李士纯 (1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卢氏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168)

小史料四则

- 红二十五军过卢氏 (16)
李季突围在卢洛 (47)
卢氏网球队曾获区、省冠军 (54)
姓氏·卢氏姓氏·中国姓氏 (99)

“四友饭店”设立前后

——忆中共卢氏地下组织建立与发展

赵致平



编者按：本文作者赵致平同志，河南省温县人，现年七十五岁。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革命，同年五月入党。先在陕西三原青训班学习，后到陕北公学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任中共陕灵地委宣传部长兼卢氏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六月，奉调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抗战胜利后，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历任张垣机械厂、新中机械厂、边区军工局子弹炮弹厂副厂长。解放战争时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回河南，先在中共南阳地委工作，继任陕州地委组织部部长、陈留地委委员兼中牟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来，一直在省委、省府机关工作。先任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曾派任信阳地委副书记年余），后任省人委副秘书长兼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三年退居二线，现已离休。

抗战胜利后，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历任张垣机械厂、新中机械厂、边区军工局子弹炮弹厂副厂长。解放战争时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回河南，先在中共南阳地委工作，继任陕州地委组织部部长、陈留地委委员兼中牟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来，一直在省委、省府机关工作。先任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曾派任信阳地委副书记年余），后任省人委副秘书长兼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三年退居二线，现已离休。

卢氏政协来函，要我一谈“四友饭店”。

设立“四友饭店”的前因后果，说来话长，但只宜短说。

顾名思意，“四友饭店”只不过是由四人合作开设在卢氏县城供人们吃饭住宿的一个店铺。然其真正意义则远非如此。而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共河南省委为组织动员民众进行抗战而设置在国统区卢氏山城的党的县委机关。

为行文方便，拟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抗战前期环境

从全国的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由进攻阶段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的国内政策则由溶共、限共、防共转为反共行动。在河南，特别是豫西铁路沿线一些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打击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同时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所谓“胖子”政策，在其统治区内，叫所有公教人员都填表加入国民党，并在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三青团员，控制群众的爱国活动，以实现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图谋。

卢氏（包括今栾川的大部分地区）地处伏牛山腹地，交通闭塞，封建势力猖獗。有所谓四亭（何香亭、郭焕亭、王云亭、李彦亭）二凤（李岐凤、张鸣凤）等权势人物存在，各霸一方，横行乡里。抗战开始后，随着外地党、政、军、特势力的进入和薛湛然、麻志异、薛鸿儒、李延佑、李克强等国民党的地方党、团新兴势力的泛起，逐步打破了国民党地方党政势力受封建势力制约的沉寂状态。就共产党的活动来说，早在三十年代初期，红三军、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卢氏，在沿路一带民众中，就留下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三六年

间，中共党员关周光（山西芮城人），因被阎锡山通缉流落来卢氏，到朱阳关小学执教，发动学校师生和当地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秋，河南省立洛阳师范、省立洛阳中学和陕州农林实验学校（后改区立中学）等一批中等学校，相继迁入卢氏，中共洛师支部和洛中支部就率先开展了活动。另方面，在全面抗战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本地和外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符元亮、揣得为、李士伟、史新民以及县长李万里等也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符元亮、揣得为在李万里的允准与支持下，筹办了“抗日救亡训练班”和“救护人员训练班”，公开讲授中共提出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并组织政训员、民运员到各乡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一时间，县境之内，从城镇到农村呈现出抗日救亡的高涨气氛。一些中小知识青年，到陕甘宁边区，到抗日前线，找共产党、八路军，形成了风气。到一九三九年夏季，由于全国抗战形势出现了逆转，卢氏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大大地受到压抑。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踏进卢氏这片土地的。

二、工作概况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我从陕北回到河南，受省委指派，化名刘尊世到卢氏开展工作。连同后来联系陕（州）灵（宝）阌（乡）各县，在卢工作整整两年。

我第一次进入卢氏，是以巡视员身份，由陕灵地委组织部长赵群一陪同来了解情况的。半月后，回洛阳向省委作了汇报，提出了卢氏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省委批准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我为陕灵地委宣传部长兼卢氏县委书记，当即返

同卢氏工作。

风趣地说，我是以革命作职业的“职业革命者”到卢氏来的。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相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进步力量，以适应豫西地区抗战形势的需要。回想起来，大体作有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

洛师、洛中等校迁入卢氏后，在学校支部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县城和各集镇、乡村开展了唱歌、演街头剧、讲演、刷写标语及家访座谈等形式的宣传活动。我曾以“报社记者”名义，在横涧联保召开的“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上讲了一通抗战形势。洛师支部书记张象文，曾应县长李万里之聘，到县行政人员训练班作政治教官，利用合法讲坛，广为宣传“十大纲领”及抗战前途。后因张和国民党卢氏县党部书记长薛湛然面对面辩论“应不应该坚持抗战到底”的问题，使薛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使用手中强权，诱捕了张象文。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我们的警惕。鉴于形势的逆转，我们并未束手缩脚，无所作为，而是审时度势讲究策略，相机把宣传活动引向深层。从一九三九年后期，与上层人士个别交谈的多了，大型集会少了；学校的工作，则是少造声势多注意实效，加强保密教育，搞好同学间交友和课程学习；在地方群众中，着重办好识字班和开展读报活动。

（二）统战工作。

对统战工作，毛泽东主席早有教导，并将其作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战期间，国民党内部，由于种种原因，面对大敌当前，所持态度并非一样，有极端反动的，倾向中立的和主张抗战到底的。卢氏当时县、区、乡、镇头面

人物和一些社会人士，情况也是如此。像薛湛然、麻志异、李延佑、任之久、谢泽民、李风鸣、刘秀峰（洛师训育主任）等，都是靠反共起家的，是县里反动势力的代表；像县长李万里，则是有正义感、爱国心、同情共产党、主张抗日的人士；张克彬、肖长丰、王珍贤、史新民和区中教师申中一、揣得为以及朱阳关的祝永兴、南苏村的常来鸿、县城商人梁宏池、县师校长刘谦波等，则是政治态度好或比较好的进步人士和有正义感的开明人士。我们在与之接触、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确立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我在卢氏的两年时间里，曾和李万里等许多上层人上直接或间接交往，他们对社会进步青年及其家庭子弟的爱国行为，都有所支持与帮助。对这些人，若无确凿事实证明其变得很坏时，都应该作为统战对象看待，并以此态度去看待其家属和后人。

（三）关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情况。

我到卢氏来时，已有洛师、洛中两个学校支部。卫邦新、张子祥在栾川镇已被洛师支部接收入党。陈芝汉也在陕州剧团入党后回到范里。我在卢氏工作期间，先后发展党员一百二十多人，连同洛师、洛中党员，共二百二十余人。许天民、李思靖、吴廷贤、张大伦，是我到卢氏后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八、九月间，在城关吸收了李茂林、王振寰、王觉民、郭修文等人入党。在双槐树发展了僧梁、王建辰、莫永谦、段启辰、茹秀田、杜发科等人。年底，在李家山吸收了刘好玉、贾焕文。许天民回到大石河，接收了李瑞亭（女）、李冠五。由许天民介绍在横涧吸收邵得仁、秦天斗、杨育华。城厢支部发展了李崇彩、马子健、王国亮。洛师支部党员邵文斌到杜关学校任校长后，也发展了骆锡嘏等

人，并建立了支部。

范里镇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先后吸收的党员有何俊雅、张建国、付文治、张于国等，是我协同陈芝汉在那里建立的党组织。

从一些学校的建党情况看，除洛师、洛中两校党的活动较早外，在区中，一九三九年八月已发展有马志远、张耀汉、张永奇、张汴成等。之后，进德中学（许昌迁入，驻高村）、莘原中学（城内南街）、洛职（北苏村）、卢氏师范（范里）、栾川中学等校，都先后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的还建立了支部或小组。

这一时期卢氏境内党的组织状况是：

县委会：书记刘尊世，委员有崔宗舫、陈芝汉、韩大化、张心嵩、张甲（即张羽）；区委是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而建立的。一区委辖城厢、大石河、卜乡、东营子、横涧、范里等六个支部，区委书记陈芝汉；二区委辖栾川街、北凹等十余个支部，先后任区委书记的有崔宗舫、张心嵩、张子祥、杨景福；三区委辖双槐树、五里川等三个支部，区委书记僧梁，后为王建辰负责。另有县委直接管辖的洛师、洛中、杜关等支部。上述区委和支部建立后，都相继开展了活动，发展了党员，逐步扩大了党的队伍。

在党的建设上，需要说明以下情况：

1、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和白区工作方针，发展党员的成分，多属各类中、小知识分子和在国民党政、教、军基层担任公职的人员。工人、农民发展的也有，但数量很少；

2、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就业，经组织批准，中共党

员，可填表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共、限共的对策；

3、对一些挂名国民党、三青团员的公职人员，根据本人的政治表现和斗争的需要，也有发展为共产党员的。

这些问题，用现在的标准看，好像不可思议，但确是当时斗争之常态。

（四）组织群众向旧势力开展斗争。

这方面大的活动有以下几事：

在洛师，首先进行了反对训育主任刘秀峰的斗争。刘秀峰是三青团系统为打击学校进步力量和扼制抗日救亡活动而派进学校的骨干分子，名义上是训育主任兼讲政治课。他不学无术，讲课常出洋象，还藉他的特殊身分，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对此，学生十分不满。在党员带领下，对他实行了罢课，迫使刘秀峰卷起铺盖离校。事后，虽然有两名学生（一名党员）涉嫌被除名，但校方对学校进步力量，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也包含着怀恨在心。

在东营子村，进行过反校董杜玉兰的斗争。杜是营子一带的大乡绅、地头蛇。贪污校款，欺压百姓，教师不满，民众愤恨。经县委研究，在校长陈芝汉（县委委员）、联保主任张大伦（地下党员）的发动下，清算了杜的账目，揭露了他在群众中的丑恶行径，并呈报教育局批准，撤了他的职务。经群众推选了一位老实有为的农民王永福（后入了党并任支书）担任校董；在双槐树，区长李凤鸣，是当时在任区长中恶迹昭著的突出代表。他贪赃枉法，卖兵受贿，群众怒不敢言。一位有正义感的医生屈宪周（后吸收为党员）在横涧党支部书记邵德仁的影响下，经过串联发动，率领群众到双槐

树街向李开展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将李告到陕州专署。结果，这个作恶多端，政治上的走“红”人物，被撤职调押陕州，后死于狱中；在二区（栾川）庙子镇进行过反地头蛇张绍千欺行霸市和将联保主任郝晋卿（区长任子久的亲信）驱逐出联保的斗争。

其他各支部和党员，为维护群众利益所进行的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尚有不少事例，这里就不再赘述。

（五）关于掌握武装枪支弹药的工作。

日军侵占了中条山，和豫西只一河之隔，战场可能发展过来。为了卢氏一带的进步力量能掌握一定的武装实力，我们在发展党员和在与统战人士广交朋友上，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像闻名全县的大匪霸何香亭的长子何俊雅，我们根据他的表现，认为他属于封建势力的叛逆者，吸收他入党，也是基于前述考虑的。顺便说一句，何俊雅同志在他那样一个家庭环境的长期影响下，没有继承父辈的祖业，毅然决然选择了革命道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参加党组织后，以其客观有利条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还保护了一些同志化险为夷；在卢氏县的地方武装县大队内，吸收了两个班长入党；还发展了几个身为联保主任的实权人物入党。同时，也还鼓励有条件的党员购买了点武器。这些枪支弹药，虽然没有派上大的用场，但有的也起了作用。

（六）关于对党员的教育。

根据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环境特点（地下隐蔽状态），对新党员大都进行了时事形势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保密、遵纪重要性的教育和革命者应有的气节教育

等。在形势较好时，各学校党组织都订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西安出版的《老百姓报》，相互传递学习；从上级党组织带回的文件、资料及口头指示精神，我们都采取不同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外出开会，还先后带回了《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解放》杂志、《新中华报》等书报刊物，供党员学习。我也曾编写了一个简单的《党员课本》，印刷下发。从洛阳买了一部油印机，不巧，返回时与县财委主任涂云亭乘坐一部马车。考虑到若被发现，将会招致麻烦。所以车到范里时我就托词下车，将油印机藏于何俊雅家中。因有何香亭的门卫把守，工作起来倒也安全。

一般说来，党员们通过组织开会、个别交谈与读报教育，大家对党的“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政治主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党的宗旨、党的阶级性，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行动上，也都是听从指挥、遵守纪律的。

（七）关于骨干党员的撤退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纲领更加见之于行动，抗战大局更向困难程度逆转，党中央为了避免白区党的工作遭受更大损失与破坏，制定了“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指示把一部分党员骨干撤离白区。卢氏的党组织是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指示的。

经县委研究，当时确定撤离的党员骨干有：张子祥、卫邦新、段海山、张文炳、胡孔章、僧梁。对陈芝汉、孟继孔、张大伦、王振寰等，也曾考虑过撤离，但因种种原因（如家庭不便离开或尚有留下工作的条件等），没有随第一批撤出。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什么叫“脱党”，什么叫“失掉关系”。有些人把没有撤离留下来的同志笼统地称之为“脱党”或“失掉组织关系”，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卢氏的地下党员，在骨干党员撤离后，留下的同志并未“睡大觉”，而是按照党的指示继续履行着“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更加隐蔽的战线上进行着这样那样的对敌斗争。我走之后，一九四二年底，省委还派王桂五同志到卢氏检查落实骨干党员的撤离工作。到了一九四三年，因康生把河南、四川、甘肃等省的白区党诬蔑为“红旗党”（假共产党），对撤到延安的骨干党员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被毛主席发现纠正），对留在白区的党员，统统割断了联系。这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组织脱离了党员，而不是党员脱离了党；是组织中止了与党员的联系，不是党员失掉了组织关系。

三、“四友饭店”的设置情况

“四友饭店”设立于一九四零年元月间（农历正月初五过后开业）。地址在城内东街路北（今服务大楼处）。作为县委机关来说：县委先曾设在东管子联保处内。其背景是趁张大伦同志任营子联保主任之机，安排许天民同志到他那里当书记（即文书），陈芝汉同志到营子中心学校当校长，我以大伦的亲戚关系把住处也安排到联保处（以卖文具商到各地联系指导工作，回去就在那里落脚）。时间不久，卢籍员石中立、保丁王国良被我们接收入党。这个联保处可以说为我们所掌握。中共卢氏县委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天夜里，在营子